

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在工會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并不在對工會的原則性的估價方面。托洛茨基經常援引的我們黨綱中關於工會作用的那些人所共知的條文和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關於工會的決議¹，現在有效，將來仍然有效。工會和經濟機關應當而且一定要融合起來（“結合”），這是沒有人爭論的。我國現今的經濟恢復時期要求目前還只是口頭上的產業工會逐漸變成能振興我國各基本工業部門的真正的產業工會，這是沒有人爭論的。簡單地說，我們的意見分歧並不是原則性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也很少涉及在工會和整個工人階級中建立勞動紀律的必要性問題。有人說我們黨內有一部分人“放鬆了韁繩”，因而使群眾受自發勢力的玩弄，這是一種未加思考的說法。黨員在工會中和工會在工人階級中的領導作用始終是無可爭辯的真理。

我們的意見分歧更少涉及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成員的質量問題。大家一致認為這些機構的成員遠不夠理想，工會已被一連串軍事動員和其他動員弄得空虛不堪，應當把工會舊的工作人員交還工會並增添新的工作人員，必須供給它們設備等等。

不，我們的意見分歧不在这方面。

一 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

我們的意見分歧在下列几个問題上：加强工人階級的劳动紀律的方式問題；对待被吸引来参加恢复工业事业的工人群众的方法問題；把目前薄弱的工会变成能够恢复我国工业的强有力的真正的产业工会的途徑問題。

有两种方法：强迫方法（軍事方法）和說服方法（工会方法）。第一种方法决不排斥說服的因素，而說服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强迫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輔助手段。第二种方法也不排斥强迫的因素，而强迫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說服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輔助手段。把这两种方法混淆起来是不能容許的，正像不容許把軍隊和工人階級混淆起来一样。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批党的工作人員醉心于軍隊中軍事方法的成就，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这种方法搬到工人中間来，搬到工会中来，以便在巩固工会和恢复工业方面获得同样的成就。可是这批人忘記了軍隊和工人階級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对軍隊适用的方法对工人階級及其工会就可能是不适用的和有害的。

軍隊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是由两个基本社会集团即农民和工人組成的，而前者比后者多好几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²在論证軍隊中主要采用强迫方法的必要性时所待的出发点是：我們的軍隊主要是由农民組成，而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方法使他們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由此就产生了像政委制度和政治部、革命法庭、紀律处分、全面委任制等等純粹軍事性的工作方法。

与軍隊相反，工人階級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集团，他們的經濟地

位使他們傾向于社会主义，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鼓动，自願地組織工会，所有这一切使他們成为苏維埃国家的基础和精华。因此，主要采用說服方法是我們产业工会的实际工作基础，这是毫不足怪的。由此就产生了像解釋、群众性的宣傳、發揮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和自动精神、选举制等等純粹工会的工作方法。

托洛茨基的錯誤就在于他低估了軍隊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差別，把軍事組織和工会混为一談，企图(大概是由于惰性)把軍事方法从軍隊中搬到工会中来，搬到工人階級中来。

托洛茨基在一个文件中說道：“把軍事方法(命令、惩罚)和工会方法(解釋、宣傳、自动精神)单纯地对立起来就是考茨基主义、孟什維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偏見……在工人国家中把劳动組織和軍事組織对立起来就是可耻地向考茨基主义投降。”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說的。

把“考茨基主义”、“孟什維主义”等廢話撇开不談，很明显，托洛茨基不了解工人組織和軍事組織之間的差別，不了解在消除了战争和恢复工业的时期把軍事方法同民主方法(工会方法)对立起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把軍事方法搬到工会中来是錯誤的、有害的。

这种不了解就是不久前出版的托洛茨基关于工会的一些論战性小册子的基础。

这种不了解就是托洛茨基的錯誤的根源。

二 自觉的民主和被追的“民主”

有些人认为，談論工会內的民主是放空炮，是党内生活的某些

現象所引起的时髦風气，认为关于民主的“空談”将被厌棄，而一切将“照旧”进行。

另外一些人认为，工会內的民主在实质上是一种让步，是对工人的要求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让步，认为我們在这里与其說是在严肃认真地办事，不如說是在耍外交手腕。

不用說，这些同志大錯特錯了。工会內的民主，即通常称为“工会內部无产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是群众性的工人組織所固有的自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以認識到对組織在工会內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經常采用說服方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一点为前提的。不認識到这一点，民主就会变成空談。

当战争正在进行和危險迫近的时候，我們組織发出的“支援前綫”的号召得到了工人热烈的响应，因为灭亡的危險在当时很容易觉察，因为这种危險十分具体，大家一目了然，这就是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的軍隊在向前推进并在恢复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权。当时发动群众是不困难的。但是現在，当軍事危險已經消除，而群众对于新的危險即經濟危險（經濟破坏）还远不那么容易觉察的时候，单靠号召来发动广大群众就不行了。当然，粮食和布匹的缺乏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但是，第一、人們总是想尽办法寻找粮食和布匹，因此粮食不足和商品缺乏的危險远沒有像軍事危險那样鞭打群众；第二、誰也不会断言群众一定認識到經濟危險（缺乏機車、农业机器、紡織工厂和冶金工厂，缺乏电站的設備等等）和不久以前的軍事危險同样现实。为了推动千百万工人階級群众同經濟破坏作斗争，就必须發揮广大群众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自动精神，必須用具体事实來說服他們，使他們确信經濟破坏也和昨天的軍事危險一样是现实的致命的危險，必須通过按民

主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会吸引千百万工人参加恢复生产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經濟机关同經濟破坏的斗争变成整个工人阶级的切身事业。否則就不可能在經濟战綫上取得胜利。

简单地說，自觉的民主，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是产业工会唯一正确的方法。

被迫的“民主”同这种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讀了托洛茨基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后，可能认为托洛茨基在实质上“也”贊成“民主”方法。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工会的工作方法問題不是我們的分歧点。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托洛茨基的“民主”是被迫的、不彻底的、无原則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能补充对工会不适用的軍事官僚主义方法。

請你們自己判断吧。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中央做了决定，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會議共产党党团根据中央的决定通过了下面的決議：“必須最坚决最有計劃地反对由集中制和軍事化的工作方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剛愎自用、官場习气和对工会的瑣碎监督……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人中央委员会）來說，因特殊条件而实行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铁道总政治部）的时期也开始結束”，因此，代表會議的共产党党团“建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大力推行和广泛使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責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积极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并以与其他工会組織同等的資格加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見“真理报”第二五五号）。但是，托洛茨基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竟不顾这项決議，在整个十一月份內繼續实行半官僚主义半軍事的老路綫，照旧依靠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企图“整刷”和破坏全俄工

会中央理事会，捍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对其他工会组织的特权地位。此外，托洛茨基在十一月三十日“給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中又“突然”声明說：“水运总政治部……在最近两三个月内無論如何还不能解散。”結果怎样呢？在这封信发出六天以后（十二月七日），同一个托洛茨基又在中央委员会“突然”贊成“立即撤銷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原則将这两个机关的全部人員和资产移交給工会組織”。他是贊成这一点而反对七个中央委員的八个中央委員之一，当时有七个中央委員认为撤銷这些机关还不够，他們要求更換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現有的成員。为了挽救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現有的成員，托洛茨基贊同撤銷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总政治部。

这六天内有什么变化呢？也許铁路員工和水运員工在这六天内已經成长到不再需要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了吧？或者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国内或国外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了吧？当然不是。問題在于水运員工坚决要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撤銷总政治部，更換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員，而托洛茨基集团怕自己垮台，希望至少能保住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旧有的成員，于是不得不退却，做了一些誰也不能滿足的局部的让步。

事实就是这样。

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被迫的、不彻底的、无原則的“民主”同“工会内部无产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党中央还在十一月初就提出了“工会内部无产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它对振兴我們的产业工会是非常必要的。

在苏維埃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討論会³上，托洛茨基在他

的結束語中反对把政治因素加进关于工会的爭論中去，断言这和政治毫不相干。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根本不对的。未必用得着证明，在工农国家里，沒有一項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決議，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工人階級的決議，可以不在一定方面反映国家的政治状况而被通过。并且一般說来，把政治和經濟分割开来是可笑的不严肃的。正因为如此，对每一項这样的決議必須預先也从政治方面来評价。

請你們自己判断吧。

現在可以认为已經证实，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已經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实践推翻了。托洛茨基领导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它去影响其他工会，本想活跃和振兴工会，吸引工人参加恢复工业的工作。可是事实上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的是：同工会内部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冲突，大多数工会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分裂，組織到工会中的工人“下层”痛恨“专员”。換句話說，不但沒有使工会振兴起来，而且連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开始瓦解了。毫無疑問，如果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搬到其他工会里去，那末那里也會出現同样一幅冲突、分裂和瓦解的图画。結果工人階級中就会产生涣散和分裂。

工人階級政党能不顧这些事实嗎？能不能断定說，我国工人階級团结在統一的工会中或者分裂成不同的互相敌对的集团，这对我国的政治情况來說都是一样呢？能不能說，在估計对待群众的方法問題上政治因素不应当起任何作用，說这同政治毫不相干呢？

显然不能。

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現

在約有一億四千萬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要管理這樣的國家，蘇維埃政權就必須得到工人階級牢固的信任，因為只有通過工人階級並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領導這樣的國家。但是要保持和鞏固大多數工人的信任，就必須不斷發揮工人階級的自覺性、自動精神和主動性，必須用共產主義的精神不斷教育工人階級，把他們組織到工會中來，吸引他們參加共產主義經濟建設事業。

用強迫和從上面“整刷”工會的方法來實現這個任務顯然是不可行的，因為這些方法會分裂工人階級（請看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會引起對蘇維埃政權的不信任。此外，不難理解，採用強迫的方法一般說來既不能發揮群眾的自覺性，也不能加強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

顯然，只有用“工會內部無產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只有用說服的方法，才能完成團結工人階級、發揮他們的自動精神和加強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的任務，為了發動全國去同經濟破壞作鬥爭，這種信任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可見，政治也是贊成用說服方法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載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真理報”第十二號

署名：約·斯大林

（譯文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七年
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卷第五頁至
第十三頁）

关于党的任务

(在有小组长、爭論俱乐部成員和支部委员会委員
参加的俄共(布)紅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
會議上的报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同志們！首先我必須說明，在这里我不是代表党中央，而是以个人名义来做报告的。如果會議願意听取这样的报告，我就来談談。（喊声：“請讲吧。”）这并不是說，我在这个問題上和中央有什么分歧，——絕對沒有。我以个人名义講話，只是因为中央关于制定改善党内状况办法的委员会⁴最近就要向中央呈报自己工作的結果，这个結果还没有呈报，所以我現在还没有合法权利代表中央講話，虽然我相信，我現在要对你們讲的基本上会把中央对这些問題的态度表达出来。

爭論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

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第一个問題，就是报刊上和支部里正在进行的爭論的意义問題。这次爭論說明什么呢？它标志着什么呢？这是不是一场闖入党内平靜生活的暴風雨？这次爭論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党瓦解和崩潰的标志，或者像另一些人說的那樣，是党蜕化的标志？

同志們，我認為都不是：既不是蛻化，也不是瓦解。事實上，黨在最近時期壯大了，它清除了大量的廢物，它更加無產階級化了。你們知道，兩年前我們至少有七十萬黨員，你們知道，當時有好幾千黨員退出了黨或者被驅逐出黨。其次，在這段時間內，由於工業的發展使工人階級的物质生活狀況有所改善，由於熟練的老工人從農村歸來，由於在產業工人中掀起了文化高漲的新浪潮，黨的成員改善了，黨的質量提高了。

一句話，由於這一切條件，黨壯大了，質量更高了，它的要求提高了，它的要求更加嚴格了，它想比以前更多地知道一些東西了，它希望比以前更多地解決一些問題了。

已經展開的爭論不是黨軟弱的標志，更不是黨瓦解或蛻化的標志，而是黨有力的標志，黨堅強的標志，黨的成員質量改善的標志，黨的積極性提高的標志。

爭論的原因

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恰恰在目前時期，恰恰在今年秋天，黨內政策問題具有尖銳的性質。怎樣解釋這一點呢？原因在哪裡呢？同志們，我認為這裡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今年八月我國某些地區因工資問題而掀起的不滿和罷工浪潮。這次罷工浪潮暴露了我們一些組織的缺點，暴露了我們一些黨組織和工會組織不過問企業中所發生的事件的現象；這次罷工浪潮也暴露了我們黨內存在著一些力求瓦解黨的、實質上是反共的秘密組織。所有這些因罷工浪潮而暴露出來的缺點都以如此耀眼的閃光，如此令人清醒的光綫映射到黨的身上，使黨

感到必須改变党内状况。

党内政策問題恰恰在这个时期尖锐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們党员同志大批休假。休假当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休假的人很多就使得党内生活的节拍恰恰在工厂里产生不滿情緒的时候大大地緩慢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积累下来的缺点恰恰在今年秋天这个时期暴露出来。

党内生活的缺点

我已經讲过，我們党内生活的缺点是在今年秋天暴露出来的，这些缺点提出了改善党内生活的問題。这些党内生活的缺点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像有些同志所想像的那样是党的路綫不正确？或者党的路綫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离开了正确的道路，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而被歪曲了？

我认为我們党内生活的主要缺点是：虽然体現在我們历次代表大会決議中的党的路綫是正确的，但地方（当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某些地区）上的实践是不正确的。虽然我們党的无产阶级民主路綫是正确的，但地方上在实践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了这一路綫。

这就是主要的缺点。历次代表大会（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所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綫和我們的地方組織在执行这一路綫时的实践之間存在着矛盾，——这就是党内生活一切缺点的根源。

党的路綫說，我們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問題（当然，那些急待解决的或者有关軍事秘密和外交秘密的問題除外）一定要在党的會議上进行討論。党的路綫就是这样說的。但是党的地方（当然

不是任何地方)上的實踐却認為,黨內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實在沒有多大必要在黨的會議上進行討論,因為中央和其他領導組織自己會解決這些問題。

黨的路綫說,如果沒有像黨齡等等不可克服的障礙存在,我們黨的負責人就一定要由選舉產生。你們知道,按黨章規定,省委書記必須是十月革命前入黨的,縣委書記必須有三年黨齡,支部書記必須有一年黨齡。但是黨的實踐却往往認為,既然需要黨齡,那就是說不需要真正的選舉了。

黨的路綫認為,必須使黨員群眾了解經濟機關、企業和托拉斯的工作,因為我們的黨支部對企業中的缺點一定要向非黨群眾負道義上的責任。然而黨的實踐却認為,既然有中央委員會向經濟機關發布指示,既然經濟機關受這些指示的約束,即使沒有黨員群眾自下而上的監督,這些指示也是會被執行的。

黨的路綫認為,各部門的負責工作人員,不論是黨的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工會工作人員或軍事工作人員,儘管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各有專業,但是他們相互之間還是要有聯繫,他們都是一個整體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為他們都是為無產階級的共同事業工作,而這個事業是不能分裂成幾部分的。黨的實踐却認為,既然有工作上的專業化,有黨本身的工作、經濟工作、軍事工作等等的分工,黨的工作人員就可以不對經濟工作人員負責,經濟工作人員就可以不對黨的工作人員負責,一般說來,他們之間的聯繫就必然削弱甚至失掉。

同志們,在我們歷次代表大會(從第十次代表大會起到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止)的一系列決議中所確定的黨的路綫和黨的實踐之間的那些矛盾,一般說來就是如此。

我决不因为党的路綫被这样歪曲而責备地方組織，因为，如果分析一下，这里与其說是我們地方組織的过錯，不如說是它們的不幸。这种不幸表現在哪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一点我在下面要讲到，但是，我想把这一事实肯定下来，以便解釋这种矛盾，然后試图提出改进办法。

我也决不认为我們中央沒有过錯。它同其他一切机关和組織一样也有一些小过錯，——中央在这里也有一部分过錯和一部分不幸，中央的这一部分过錯，至少表現在它由于某种原因而沒有及时揭露这些缺点，沒有設法克服这些缺点。

但是現在問題不在这里。現在問題是要弄清我刚才讲过的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这些缺点是怎样造成的呢？怎样才能把它們消灭呢？

造成缺点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們的党組織还没有鏟除或者至今还没有鏟除战争时期的某些残余，这个时期虽然已經过去，但是在我們工作人員的头脑中留下了党内軍事作風的残余。我认为这些残余表現在下面这种对党的看法上：党不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不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战斗組織，而是某种类似机关系統的东西，某种由低級職員和高級職員組成的、类似許多机关的綜合体的东西。同志們，这是一种极端錯誤的看法，它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看法是战争时期給我們遺留下来的残余，那时我們使党軍事化，不得不把黨員群众的自动性問題挪到次要地位，那时战斗命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不記得这种看法是什么时候以完备的形式表現出

来的，但是这种看法或者这种看法的因素仍然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同志們，我們必須竭尽全力同这种看法作斗争，因为它是一种最现实的危险，它造成有利条件，使我們党的实质上是正确的路线在实践中受到歪曲。

第二个原因是我們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对党和工作人員有某种压力。一九一七年，当我们向上走的时候，向十月革命走的时候，我們是这样想的：我們將要有公社，这种公社将是劳动者的联合；我們將消灭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在最近时期內，那末经过两三个短短的时期，国家就能变成劳动者的联合。可是实践表明，这对我們說来还是一种遙远的理想，要使国家摆脱官僚主义分子，要把苏维埃社会变成劳动者的联合，人民必須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周圍必須有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就没有必要保存大量的常备軍，保存常备軍是需要大量的开支和龐大的机构的，因此它的存在就会影响其他一切国家机关。我們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而且在长时期內还会是这样的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有我們的党员同志，而这个机关的环境——据我看来是气氛——是这样的，它促使我們的党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党組織官僚主义化。

同志們，造成缺点的第三个原因是我們的一些支部缺乏积极性，落后，有的甚至全部是文盲，边疆地区尤其是如此。这些地区的支部很不积极，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給歪曲党的路线造成了有利条件。

第四个原因是地方上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党员同志。不久以前，我在中央委员会听过一个乌克兰組織的代表的报告。做报告的同志极有才能，前途远大。他說，一百三十个支部中有八

十个支部的書記是由省委会委派的。这位同志駁斥了认为这个組織这样做是不对的意見，他所持的理由是支部里沒有識字的人、沒有够党龄的人以及支部自己請求派書記給它們等等。我可以說，这位同志有百分之五十是說得过火的，事实上，这里的问题不但在于支部里沒有受过訓練的人，而且在于省委会过于热心和沿襲旧傳統。但是，如果省委会有一百之五十正确，那末，既然在乌克兰有这样的支部，在組織很年輕、党員干部和識字的人都比乌克兰少的边疆地区就更應該有这样的支部，这难道还不明显嗎？这也是造成有利条件，使我們党的实质上是正确的路綫在实践中受到歪曲的一个原因。

最后，第五个原因是通报工作做得很差。我們的通报工作，首先是中央的通报工作做得不好，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工作过于繁忙。地方上也很少向我們汇报。應該結束这种情况了。这也是我們党內的缺点积累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必須采取哪些办法来消灭这些缺点呢？

第一、必須用一切办法不倦地反对我們党內的战争时期的殘余和习惯，反对下面这种錯誤的看法：我們党似乎是一个机关系統，而不是积极思考、独立活动、充滿活力、破坏旧事物和創造新事物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組織。

第二、必須提高党員群众的积极性，党員群众所关心的一切問題，只要可以公开討論，都讓他們进行討論，对于各級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議，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

党的紀律成为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紀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黨員群众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經驗丰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黨員群众准备必要的条件，逐步地从下层选拔出新的积极的工作人員和新的領導者。

第三、如果没有像党齡不够等等不可克服的条件存在，那末一切党組織和負責人必須真正由选举产生。在提拔某些同志担任党的負責工作时，必須从實踐中鏟除忽視組織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現象，必須真正貫徹选举原則。

第四、在中央委員會、省委員会和区域委員會下面必須有常設的各部門負責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党的工作人員、工会工作人員、軍事工作人員）會議；必須定期召开會議，在会上提出會議认为必須提出的問題；必須使各种工作人員之間的联系不致中断，使所有这些工作人員感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大家庭里的一員，是在为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事业即无产階級的事业工作；必須在中央和地方組織周圍造成一种环境，使党能够取得和檢驗我們各部門負責工作人員的工作經驗。

第五、必須把我們生产部門的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 and 托拉斯的工作进程有关的問題方面来。必須使支部了解我們企业和联合企业的管理机关的工作，使它們能够影响这一工作。你們是支部的代表，你們一定知道我們生产部門的支部在企业的工作进程方面向非党群众所負的道义上的責任多么大。支部要能够在工厂里領導并帶領非党群众，能够对企业的工作进程負責（对于企业中的缺点，支部无条件地要向非党群众負道义上的責任），就應該了解这些工作，就應該有可能这样或那样地去影响这些工作。因此，必須吸引支部討論与企业有关的經濟問題，必須經常举行有托拉斯

内部各企业的支部代表参加的經濟會議来討論与托拉斯各項工作有关的問題。这是为丰富黨員群众在經濟方面的經驗以及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所必需的可靠方法之一。

第六、必須提高我們党支部的质量。季諾維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說過，我們某些地方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圍的非黨群众。

当然，这种說法不能概括和适用于所有的支部。确切些說大概是这样：如果我們沒有把我們的党支部弄得很空虛，如果我們沒有从这些支部里調人出来担任經濟、行政、工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末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現在高得多，在非黨群众中也会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来我們从支部調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末这些支部就会比一切非黨工人，即使是很进步的非黨工人强好几倍，这难道还用证明嗎？正因为黨沒有另外的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因为黨今后仍然不得不利用这个源泉，如果我們不采取緊急办法来改善我們支部的质量，那末它們的文化水平今后还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須在支部里尽量加强黨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須拋棄我們的地方組織往往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現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当醉心于形式主义；黨可以而且应当放寬从工人階級队伍中接收新黨員的条件。地方組織已經开始进行这项工作。黨应当掌握这项工作并开展一个有組織的运动，使产业工人易于入党。

第七、必須加强非黨工人工作。这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黨員群众积极性的办法。我必須指出，我們的組織对吸引非黨工人参加我們苏維埃机关至今还很少注意。比如拿現在正在进行的莫斯科苏維埃选举來說。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大缺点